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八项规定锻造百年大党新风骨

□ 宋友文 饶蕾

党的作风正，人民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自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重要切入点，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回顾中央八项规定十多年的实施历程，这一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以雷霆万钧之势正风肃纪，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锤炼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锻造了百年大党的新风骨。

铁规破积弊

中央八项规定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面对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强烈期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将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中央八项规定应运而生，成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一刀”。

从历史维度审视，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是党对百年作风建设传统的继承发展。从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三大优良作风”，到改革开放初期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党的作风建设始终遵循“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逻辑。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600余字的简洁篇幅确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不喊空洞口号，直面党的作风建设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这种刚性约束打破了“运动式治理”的窠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

从理论内涵分析，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决定的。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防止公职人员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一论断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发展。通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系，使全体党员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底色。

中央八项规定以“铁规”之姿破除作风积弊，关键在于把握了“三个统一”：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施治的统一，从精文减会到规范出访，从厉行节约到改进警卫，中央八项规定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形成了涵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作风建设，其成效不仅体现在违纪问题的严查严治，更体现在政治生态与国家治理效能的重塑，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会风气欣欣向荣

■当前“四风”问题呈现出隐形变异、风腐交织等新特征，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创新监督手段，运用大数据筛查、交叉互查等方式深挖隐蔽问题。作风建设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韧劲，对顶风违纪者露头就打

盖工作，生活，学习全领域的制度闭环。二是坚持以上率下与层层传导的统一。中央政治局同志调研考察轻车简从、不搞迎送宴请的务实作风，带动省、市、县各级领导干部对标看齐，形成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政治自觉。三是坚持制度约束与文化培育的统一。制度性约束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速度、力度、深度持续提升，典型案例的持续通报既强化了“不敢腐”的震慑，更培育了“不想腐”的土壤。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进程充分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转化为执政实践，使上层建筑主动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释放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能。

清风铸党魂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下的作风变革与治理效能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作风建设，其成效不仅体现在违纪问题的严查严治，更体现在政治生态与国家治理效能的重塑，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会风气欣欣向荣。中央八项规定以制度为根基，以监督为利剑，以民心为依归，不仅重塑了党员干部的精神风貌，更以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生动诠释了“清风铸党魂”的深刻内涵。

中央八项规定的生命力，在于以具体制度约束权力运行。通过对限定会议规格，规范调研流程等具体化条款的设定，将抽象的政治纪律转化为具象的行为指南，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撬动了根深蒂固的官场积弊。在党中央的持续推进下，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四风”问题纳入负面清单，建立“全周期管理”机制，形成教育提醒、监督检查、问责整改的闭环链条，制度创新为作风建设注入了持久生命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2024年，全

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万多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万多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2万余人。这组数字背后，是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的持续高压态势。这种“制度笼子越扎越紧”的实践，印证了作风建设从“治标”向“治本”的跨越，制度的刚性逐步转化为干部心中的戒尺，推动“不敢腐”向“不想腐”升华。

治理效能的提升集中体现为政治生态的持续净化与党群关系的稳中向好。截至2025年，中央八项规定已实施逾12年，实施流程从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到催生绿色出行文化，从破除“面子工程”到释放基层创造力，从约束权力任性到重构公权伦理，其成效远超作风建设本身。实践表明，群众既是治理效果的最终评判者，也是治理智慧的源头活水，他们的日常诉求往往折射出制度运行的盲区，而基层实践中积累的“土办法”则蕴含着破解形式主义的关键密码。若是基层干部从“牢骚话”找问题根源，在“家常话”中学解决方法，政策制定便更接“地气”；若是将“急难愁盼”化为行动清单，“群众满意”成为衡量标尺，作风建设便升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成效，充分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著名论断。干部从酒桌回归书桌，从应付检查转向谋划发展，便有更多精力投入脱贫攻坚、民生改善；公款消费的虚火消退，厉行节约便催生健康的市场生态，推动餐饮、礼品行业回归理性。这场作风革命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同时，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治理体系的动态优化，以持续性的自我革新保持政治生态的生机活力。这生动诠释着“清风铸党魂”的内涵，即以纪律的清风涤荡污浊的尘埃，将制度的理性与信仰的温度共同熔铸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从而提升人

民心中对党的政治认同，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不竭的治理动能。

铁纪护征程

以作风建设“金色名片”锻造百年大党新风骨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在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充分彰显了党在作风建设上的决心。当前“四风”问题呈现隐形变异新特征，有通过电子红包、物流快递实现“隔空送礼”，有借“红色教育”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有以“数字赋能”包装“指尖形式主义”，作风建设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是要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化风成俗，从而以好的作风树立形象、赢得民心。

一方面，要以精准监督破解作风顽疾新变种。当前“四风”问题呈现出隐形变异，风腐交织等新特征，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创新监督手段，运用大数据筛查、交叉互查等方式深挖隐蔽问题。作风建设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韧劲，对顶风违纪者露头就打。另一方面，要构建标本兼治的制度体系。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度融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建立“三不腐”协同机制。更深层次上，要用文化滋养厚植作风根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成的“三大作风”，是新时代作风建设的源头活水。借助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化，引导党员干部从延安整风运动中汲取智慧，把“三严三实”要求转化为行动自觉。要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价值追求内化为精神基因，外化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正以“金色名片”重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风骨。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持续擦亮作风建设这张名片，既要保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的战略定力，又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解决深层次问题，以优良作风凝聚14亿多人民的磅礴伟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探索设立民营企业政策观察员制度，加快落实“负面清单”制度

让民企“敢投、愿投、能投、善投”

□ 胡文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大力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是当前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经济形势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提振民企投资信心至关重要

民营企业投资是确保宏观经济持续稳定的关键抓手。当前，民营经济已经是国民经济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50%，是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60%以上的GDP，70%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的城镇就业，在我国每10个新开发的产品中有8个来自民营企业，每10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就有9家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的重要主体，是国家税收、社会财富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来源。

民营企业投资是确保经济发展活力韧性的关键引擎。民营企业通过高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持续为国民经济注入创新动能与竞争活力。从发展活力来看，民营资本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灵活决策机制，民营资本以年均12%的研发投入增速领跑市场，其在人工智能、5G通信等前沿领域的专利持有量占比超过65%。这种市场活力与创新基因持续推动着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产业格局和良性生态，有利于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

就经济韧性而言，民营企业展现出的抗风险能力尤为突出，在近年全球经济波动中，民营经济板块始终保持3.5%以上的平均增长率，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特质，有效缓冲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系统的传导效应。不难发现，从传统制造业到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通过灵活的市场响应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民营企业投资是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当前，全球产业竞争已进入“体系对

抗”新阶段，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参与者，民营企业对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至关重要。民营企业凭借技术创新突破，供应链优化整合和国际合作模式革新等多重优势，正在推动中国产业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高端环节，成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核心推动者。华为5G专利占比14%、大疆占据全球无人机70%市场份额，正在推动中国从“制造代工”转向“标准制定”，技术创新突破国际分工低端价值链陷阱；民营企业打造“模块化+数字化”供应体系，浙江小商品实现72小时全球交付，比亚迪电池自供率超90%，中国正逐渐形成抗风险能力强、响应速度快的弹性供应链竞争优势；宁德时代在德国建设零碳智造工厂，TikTok算法驱动内容生态全球化，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国际分工正逐步向产业技术协同升级。民营企业正在基于市场化力量形成“技术-产业-规则”的立体竞争力，不仅能够应对国际经贸规则变迁，还能塑造多元平衡、互利共赢的国际产业新秩序，新生态，为构建我国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战略支点。

制约民企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民营资本作为市场活力的核心载体，其投资意愿强弱直接关系到经济稳中求进的底色与成色。把握投资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既要避免“重投资轻消费”的传统路径依赖，也要防止投资快速下滑的“去工业化”过早发生。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但政策“急刹车”“急转弯”“新官不理旧账”现象仍时有发生。尽管“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多次重申，但在实际执行层面，部分领域仍存在隐性壁垒，市场准入的“玻璃门”“旋转门”仍是制约民营企业投资的关键障碍。

2022年最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缩减至117项，但在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民营企业实际进入比例仍不足30%。调查显示，32%的民营企业遭遇过市场准入“玻璃门”，新能源、航天航空、医疗卫生等领域资质审批的隐性成本居高不下。

当前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成本、转型三重压力：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高于国企1.5-2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社保缴费占利润比重超过20%，数字化转型中技术适配成本攀升。要多措并举稳定当前经济形势，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转型成本和创新成

本，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和投资效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目前地方保护主义、执法标准不统一、跨区域异地执法逐利等问题仍偶发存在。此外，诸如“民企退场论”等负面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

激活民企投资良性循环

信心比黄金更珍贵，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只要构建“政策预期稳定、市场竞争公平、法治保障有力、创新生态完善、舆论环境友善”的立体化支撑体系，必能激活民营企业“敢投、愿投、能投、善投”的良性循环。

稳定政策预期，持续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制度环境确定性是重塑信心的基础，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直接受政策稳定性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78%的民营企业将“政策连续性”列为投资决策的首要考量因素。有必要建立政策稳定性评估机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设置合理过渡期，通过“政策沙盒”试点、企业意见征询等方式增强政企互信。推广“政策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建立从政策制定、执行到评估的全流程规范，探索设立民营企业政策观察员制度，切实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政府还应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产权保护等制度改革，持续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成本和经营风险，释放民营企业长期投资动能，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根基。

持续破除隐性壁垒，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在部分领域仍存在隐性壁垒，行政审批周期长、通过率不高且周期长，严重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加快落实“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制度，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确保不同所有制经营主体在要素获取、标准制定、准入许可、经营运营、优惠政策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加强公平竞争审查，以法治化手段消除所有制歧视。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议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推行竞争性配置机制，建立招标采购“民营企业份额保障”制度，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中确保民营企业参与比例不低于60%。

多措并举稳定经济形势，助力民营企业纾困减负。当前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成本、转

型的痛点，需构建“政策工具箱+长效机制”组合方案，通过分类施策、精准施策来破解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建议进一步优化货币金融资本政策，通过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如降准降息）与信贷定向支持（如聚焦科技创新、绿色转型领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建议设立国家级民营企业发展基金，构建“政策性担保+市场化运作”的融资支持体系；同时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科创板、创业板探索“专精特新”企业上市绿色通道，推动债券市场创新“民营企业可转债”“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金融产品。建议进一步优化财税优惠政策，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至150%，建立供应链韧性专项基金，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等。建议优化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改革，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创新潜能；构建“领军企业+科研院所+中小企业”的创新联合体，在国家级高新区试点“创新券”跨区域通用通兑，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民营企业健康法治生态和良好舆论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要根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各级政府应清晰界定“能干什么、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切实管住政府“看得见的手”。二要制定亲清政商关系规范，建立健全政商交往体制机制。一方面，紧盯“关键少数”与“窗口单位”，规范权力人员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公开化。另一方面，统一制定政商关系明细规范，让干事者有章可循、监督者有规可依，厘清政商交往红线和底线。同时，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免责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鼓励公务人员履职尽责担当尽责。三要督促民营企业完善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财务与审计监督体系，推动民营企业守法合规廉洁发展，针对民营企业相关人员腐败行为，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加大惩处力度。此外，社会舆论环境深刻影响企业家的心理预期，还要加强与宣传引导，重塑舆论导向，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立足实事求是开展舆论宣传工作，鼓励地方政府将民营企业家人重大经济决策咨询范围，科学合理地进行预期管理，营造民营经济健康舆论环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会计与财务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今年4月15日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安全也是硬道理”，从单轮驱动到双轨并行，是百年变局下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

从唯物辩证法视角来看，安全与发展的矛盾运动，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呈现。发展和安全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永恒主题，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始终统一于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需求之中。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安全诉求则体现了人类社会维持稳态的本能。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发展与安全始终是贯穿国家治理的主轴。古代王朝的兴衰交替、世界大国的崛起没落，很多时候都与发展和安全的失衡有关。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为更高层次安全提供物质支撑。安全则是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

现代社会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推向更加复杂的维度。当前，国家安全的范畴已从传统军事领域拓展至科技、文化、生态、金融、产业等多个领域，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以往在治国理政的重大议题中，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边界相对清晰分明。然而，当今世界的复杂系统性使得发展和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关联、深度交融，呈现多维交织的状态。从一国内部来看，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浓度逐渐上升。从国际层面看，大国博弈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一体化竞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变革交织，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规避认识和实践上的几个误区。

一是机械地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解为“同步推进”“平均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统一体中的主次方面依据客观条件相互转化，发展和安全这对矛盾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必然存在主导性要素。将“统筹”简单等同于“同步推进”“平均用力”，这种均衡论本质上在于把复杂的系统治理简化为线性问题，在实践中就会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战略失误。成功的统筹往往表现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例如，在科技攻关关键期适当集中资源突破“卡脖子”问题，在产业升级窗口期重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风险积聚期强化底线思维及时筑牢安全防火墙。“统筹”是一种蕴含辩证智慧的治理艺术，既要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更需要警惕“简单并列”的形式主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强调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不仅超越了将发展与安全对立的二元思维，也避免了陷入“均衡论”的实践误区。

二是片面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受传统发展观念影响，实践中仍然有一种观点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的增长。在学术语境下，增长和发展存在着本质差异。“增长”主要指经济体在数量维度上的扩张，而“发展”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如果片面将发展理解为增长，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反而会上升系统性的安全赤字，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增加、公共安全风险上升、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语境中的“发展”，显然已经跳出将GDP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核心尺度的传统发展观，其在内涵上更进一步，突出强调“高质量”，蕴含安全发展的要求。三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片面追求绝对安全。从哲学视角看，风险是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只能通过识别、规避和管控风险，使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却不能完全消灭风险。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的特征进一步消解了绝对安全的基础，各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生态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问题高度交织，任何国家都无法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自我保全。就这个意义而言，安全只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安全”。当前某些西方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视经济相互依存的基本规律，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本质上是一种以零和思维主导的单边主义行为。这种做法不仅割裂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而且加剧了全球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到破坏。历史一再表明，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任务，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路径。

坚持系统思维，深化发展和安全的协同机制改革。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本质在于全局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系统思维要求实践中打好总体战，统筹谋划重要领域改革，完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全面协调推进各领域工作。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平衡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在顶层设计上，通过构建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将安全要素嵌入发展规划的全生命周期；在政策设计上建立风险感知、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的协同机制。

精准识别和有效防控风险，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当前，国际国内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风险综合体。要始终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的综合研判评估，加快构建、完善重点领域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面对近年来全球供应链中断、技术封锁等外部挑战，统筹好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不断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引领，筑牢安全发展的战略屏障。科技创新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两难命题提供了技术路径。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中美博弈加剧，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不仅关系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关乎国家安全的底线。必须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生态、培养高端人才等方式，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的自主可控。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安全发展的实践根基。社会治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起到枢纽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中进行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作为“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安全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两大诉求在社会治理中形成交汇点。在“治理”这个交汇点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一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要推动安全治理理念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事前预防转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高效能治理推动新发展格局和国家安全格局良性互动。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科社部副教授】

把握两个『硬道理』内在逻辑

□ 何丽